

诗话徐辉

著
乘舟
边家珍
华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大象出版社



诗经
论译
(修订版)

乘舟 边家珍 华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经诠释 / 华锋著. — 修订本. — 郑州 : 大象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-7-5347-9249-6

I. ①诗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
IV. ①I207. 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6948 号

诗经诠释

SHIJING QUANSHI

华 锋 边家珍 乘 舟 著

出版人 王刘纯
责任编辑 邵培松
责任校对 钟 骄
封面设计 王莉娟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(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5597936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省四合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44

字 数 626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0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武陟县詹店镇詹店新区西部工业区凯雪路中段

邮政编码 454950

电话 0391-8373957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《诗经》全面地反映了从殷末周初到春秋中期这个漫长时代的社会现实,真实地描绘了上自天子诸侯、下至庶民奴隶的生活状况,生动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喜怒哀乐的感情,特别是它那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的创作精神,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,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。

实际上,《诗经》对后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文学的范畴之内,它的影响要广泛得多。无论在《诗经》产生之初,还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,它都不是作为纯文学典籍而存在的。当年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以《诗》教弟子,是把它作为一部生活教科书使用的,要求学生从中学到“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知识和本领,带有很强的实用目的。到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后,在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的氛围中,《诗经》又被推上国家法典的地位,被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成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。唐高宗颁《五经正义》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之后,直至清朝覆亡,《诗经》这种作为治国、教化“圣典”的地位又得到了加强,影响日益加深,在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道德、伦理、思想、艺术乃至民风民俗等诸多领域中,无不渗透着“诗教”的精神。因而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《诗经》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大、之深,在古代文化典籍中是无与伦

比的。因此,要想真正了解中国,深刻认识它的历史和民族的特点,《诗经》就是一部不能不读的书。

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历史转型时期,与此相应,文化也正在经历一个更新、重构的变革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一切往昔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文化形态,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现代人们生活的重新检验,按照“适者生存”的原则进行选择,决定取舍。毋庸讳言,《诗经》在今天业已失去了往昔作为“圣典”的意义;但作为一种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,还依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。究其原因,除人们对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热爱之外,《诗经》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艺术魅力,使它具有永恒的价值,才是最根本的。

华锋等几位同志,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对“诗经学”功夫尤深。他们通力合作,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,对《诗经》全部作品又作了新注、语译和评析,并依汉语拼音方案给原文逐字标出读音,甚便读者,这就大大地扩大了读者层面。我想,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从事这项工作,那么对进一步普及古代文化知识,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,促进精神文明建设,肯定会大有裨益。

我相信,他们精心编写的这本《诗经诠译》,是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的。

白本松

1995年9月于河南大学

(一)

《诗经》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,先秦时期又称作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。自春秋末期孔子以《诗三百》教授门徒后,《诗三百》被视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教科书,汉人视其为经典,尊为《诗经》,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《诗经》既是封建知识分子科举、仕宦的必读经书,也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。程千帆师在《詹詹录》中说:“汉以前的群经子史,是中国古代一切学术的源头。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如果对这样一些经典毫无了解,对在这样一些经典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及其作品,也就很难读透。”《诗经》是先秦、两汉典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,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也最为深远,近现代学者莫不视其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,研究著述不厌其多。华锋、边家珍、乘舟三位先生有感于《诗经》文字难识,旧注又不尽如人意,别具慧眼,通力合作撰成《诗经诠释》一书,使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所借鉴,又可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人学习的基础,其有益于艺林自不待言。

(二)

《诗经诠译》的体例对于初学者颇为有利。除原文外,每首诗都有注音、译文、评析、简注,繁简适宜,便于读者学习。

《诗经》的读音,随着古代语言的变化而变化,先秦时期的读音实难考求。尽管当代出版的有关《诗经》的注疏本常常强调某字古音当读作“某”,其依据者莫非汉代以后的旧注,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古音。所以,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采用较为变通的方法,一般以今音为主,兼顾古音。同时,直接注音的方式既有利于初学者诵读,又省去了在注释中对古音的烦琐推求。当然,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,就是无法体味出《诗经》用韵的精妙之处。因为古今音读法不同,用今音来读,《诗经》中有些篇章好像是没有韵脚的。不过,两者相比较,利大于弊,读今音更有利于读者的掌握。

《诗经》的译文,历来是注释者关注的重点。有人以信达为宗,认为诗无法翻译,强调《诗经》的译文要贴切明白。有人强调要雅致,认为《诗经》是优美的诗歌,必须译成优美的诗句。鱼和熊掌,不可兼得。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他们采用浅近的语言,以直译为主,以意译为辅,略加个别的衬字,写成节奏、韵律极佳的七言诗,韵味悠长,既保存了《诗经》诗体的特点,又准确地阐释了《诗经》的诗句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鱼丽》首章“鱼丽于罟鲙。君子有酒,旨且多”四句,质朴无文。作者译为:“篓中鱼儿蹦得欢,鲙鱼蛇鱼盛满盘。君子家有飘香酒,甘醇清冽一坛坛。”神采顿出,既准确传达了原来诗句的意思,又像是经过重新创造的艺术珍品。

《诗经诠译》的评析颇具功力,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。作者往往结合先秦时期的社会历史、风俗人情来解释诗歌的主旨,清除汉儒及后人对《诗经》的种种误会和臆说。特别是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,探本寻源,指出《诗经》中诗篇对先秦儒、道等学派形成的思想影响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,要言不烦,立论精深。如作者指出《柏舟》诗所用手法实即屈原《离骚》“香草美人”手法之所本,其诗具有深沉之忧患意识,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再如作者结合先秦民俗对《绸缪》《东门之扮》的解释,言简意赅,

令人心折。同时,为了帮助初学者学习《诗经》,作者在评析时也注意分析其篇章大意和艺术特色,以求雅俗共赏。

由于《诗经诠译》的作者很好地解决了《诗经》的读音和章句大意,其注释就采用简注形式,不做过细的考辨,而是对旧注择善而从,断以己意,使之成为《诗经诠译》中注音和译文的补充,显见作者是有意引导读者去精读原文,提高修养。

(三)

《诗经诠译》的三位作者俱为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者。华锋先生乃先师华锺彦先生季子,自幼随父习读《诗经》。边家珍、乘舟两位先生乃我同门学兄,对《诗经》颇有研究。先师锺彦先生曾撰有《诗经汇通》(未刊稿)一部,精义迭出,用以授徒。华锋、边家珍、乘舟三位先生所撰《诗经诠译》,实际上是运用《诗经汇通》的研究成果对《诗经》进行诠释和翻译,便于一般读者学习。我恳切希望三位学兄能再接再厉,将先师锺彦先生的《诗经汇通》整理出版,完成其未竟之事业,流惠于后人。我翘首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曾广开

1995年9月于开封贡院碑旁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录了殷商末期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作品，在先秦典籍中只称《诗》或按其诗篇的约数称《诗三百》《诗三百篇》，《诗经》是汉儒把它尊为经典后的称呼。

《诗经》是部重要典籍，一经问世便受到时人的重视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引《大雅·既醉》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这是最早引《诗》的记录。孔子开学习、研究《诗经》之先河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有：“丘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”开称《诗》为经的新时代。到了战国末年，荀子已将《诗》列为诸经之首，倍加重视。但《庄子》《荀子》都是私书，只能代表一家之言。直到汉宣帝时，“诏诸儒讲五经同异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，上亲称制临决焉”（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），《诗》被钦定为经典著作，《诗经》这一称谓方由政府正式确定下来，并相沿至今。与此同时，《诗经》也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去研究和探讨，开创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新纪元。经学家们把它作为教化的工具，政治家们把它当作改革的旗帜，史学家们要在它那里找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依据，思想家们则要从探索前人的思维模式与规律，文化学家们要研究两千多年来风俗民情的嬗变与发展，文学家们要从诗篇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创作，语言学家们要依据它对上古音韵加以考证，博物学家们要搞清楚书中那些草木鱼虫飞禽走兽是什么纲类。《诗经》成为一座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化

艺术宝山,引起不知多少文人学者去攀登,甚至由此产生了“诗经学”“诗经研究史”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古往今来,没有任何一部诗集,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,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原因,但与作品本身亦有极重大的关系。时至今日,我们对《诗经》的认识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我们开始以哲学、宗教、美学、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部古老的诗集。我们认为,这部典籍不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精华,更是打开我国人民审美观念、道德观念、宗教观念、思维模式形成之谜的一把钥匙。梁启超先生说:“现存先秦古籍,真贋杂糅,几乎无一书无问题,其真金美玉、字字可信者,《诗经》其首也。”(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)可见,普及对《诗经》的了解,藉以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,探索《诗经》在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,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是十分必要的。这就是我们编写《诗经诠译》最原始的动机。

关于《诗经》文本及与此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、文化背景,前人研究多矣,我们不主张对文本进行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研究,也反对进行烦琐主义的考证,更不准备用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来证实诗篇所反映的内容,只企图将诗篇所反映的真实面貌告诉读者。而在此文中,对若干热门课题稍加叙述,以使读者能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。

一、关于《诗经》的分类

《诗经》分为风、雅、颂三类,这在《周礼·春官》中就有记载,但对分类依据的认识分歧很大。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的,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之不同而划分的,亦有认为是依据作品内容之不同而划分的。众说皆有偏颇,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是音乐说:风诗为乡土之音,即诸侯所辖地域的地方俗乐;雅诗为朝廷之音,即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音乐;颂诗为宗庙之音,即宗庙祭祀时的舞乐。与此相类似的是乐器说,即风、雅、颂之不同在于演唱时使用的乐器不同。章太炎先生《大雅小雅说》认为: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;张西堂先生《诗经六论》认为:“颂”与“镛”通用,“镛”即“钟”,钟则是人们常用的乐器;郭沫若先生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释南》认为:“南”即

“铃”，铃也是一种乐器。由此郭老提出：“《诗》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大小雅，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，孳乳为曲调之名，犹今人之言大鼓、花鼓、鱼琴、简板、梆子、滩簧耳。”这个看法很精辟，它进一步证实了《诗经》分类音乐说，正因为诗的分类依据是音乐，所以才使用了不同的乐器伴奏。

二、关于“二南”的争论

《诗经》国风分为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。争议较大的是“二南”。“二南”是指周公、召公的封邑，不是封国。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有：“其在成王时，召公为三公。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；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。”故王夫之《诗经稗疏》说：“盖周公、召公分陕而治，各以其治登其国风。则周南者，周公所治之南国；召南者，召公所治之南国也。北界河洛，南逾楚塞，以陕州为中线而分之。”今三门峡市博物馆尚存周召分界石，那斑驳的石柱，仿佛是一部无言的史书，记载了流逝的岁月，记录了宗周王室的兴盛与衰亡，令人神思遐想，不能自己。因为“二南”的名称与十三国风有异，“南”又是一种乐器，《论语》仅提到过周南、召南、雅、颂，未提及风，故前人多有主张“二南”独为一体的观点。程大昌、顾炎武、崔述、梁启超等大家皆认同此说。此说疏漏甚多，高亨在《诗经简述》一文中说：“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：‘风有《采芣》《采芣》。’《采芣》《采芣》都是《召南》的一篇，可见，《左传》的作者认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属于风。《周礼·大师》《礼记·乐记》《荀子·儒效》论《诗》，都是风、雅、颂三类并举，而不及南。可见《周礼》作者、《乐记》作者和荀卿都认为《诗经》只有风、雅、颂三类，“南，属于风，不是自为一类。”这已基本阐明了“南”非一体之说。而且就“二南”本身讲，其作品反映妇女劳动、婚嫁、归宁、思夫等主题的有17篇，占“二南”总篇数的68%，与十三国风差异不大。“二南”虽大量使用虚词，仅“兮”“矣”“之”出现的篇幅就占全部作品的56%，但这与郑风相比，仍有逊色。在“二南”25篇诗作中，有24篇使用了重章叠句的篇章结构，与十三国风诗篇的结构也基本持平。可见从思想到艺术，“二南”与十三国风均为一体，不应将其独自标出。

三、关于《诗经》的作者

《诗经》的作者，诗序已“认定”了许多。某公、某侯、某王、某妃之作，比比皆是，这种论断，我们自然难以苟同。依我们看，确定诗的作者，首先要取得内证，其次得依据《左传》等史书，不能想当然。依我们看，《诗经》的作者能确定的有6篇。《邶风·载驰》为许穆夫人所作，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有许穆夫人赋《载驰》，且诗与史合，故可认定。《小雅·节南山》有“家父作诵，以究王汹”，可认定家父为该诗作者。《小雅·巷伯》有“寺人孟子，作为此诗”，可认定寺人孟子为此诗作者。《大雅·崧高》有“吉甫作诵，其诗孔硕”，《大雅·烝民》有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”，故可认定此二诗的作者为吉甫，即宣王时代的尹吉甫。《鲁颂·閟宫》有“奚斯所作，孔曼且硕”，可以认定此诗为奚斯所作。以下3篇的作者也基本可以确定，或至少可以作为一说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载：“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，曰‘常棣之华，鄂不铎铎’。故《小雅·常棣》的作者为召公虎。《国语·楚语》有：“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，犹箴儆于国……於是乎作《懿》戒以自儆也。”前人以为“懿”“抑”相通，故有《大雅·抑》之作者为卫武公所作一说。《左传·文公元年》有：“周芮良夫之诗曰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’”此诗为《大雅·桑柔》第十三章，故此诗作者可认定为芮良夫。此外，传统说法认为《小雅·小弁》为太子宜臼所作，《小雅·白华》为申后所作，《大雅·江汉》为召虎所作，《商颂·殷武》为宋襄公作，虽无具体实证，但《诗序》以降，多有从之，亦可备一说。除此13篇，其余的292篇诗歌作者难以详考，在没有新的理由和充分的证据之前，暂作存疑为好。

四、《诗经》的成书与推广

一部诗集，时间上下绵延5个多世纪，作者囊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，作者的足迹遍布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、安徽等广袤的土地，在语言、文字、音韵尚未统一，交通、信息极不发达，甚至整个国家都处

于一个松散的联邦政权时代的局面下,这部语言统一、音韵一致、结构完善的诗集能够产生并流传下来,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周太师。周太师——这些优秀的诗人兼音乐家们,首先是搜集诗,然后是用统一的音韵、文字去改造诗,最后将它推广出去。没有他们的努力,便没有《诗经》的今天。关于诗的销售,前人有“采诗说”和“献诗说”两种。《国语·周语》《国语·晋语》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均有“献诗说”的记载,白纸黑字,毋庸置疑。“采诗说”主要见于《礼记·王制》《汉书·食货志》《汉书·艺文志》,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引《夏书》佚文,《孟子·离娄篇》也有隐约的记载,此说后世虽有许多相左的意见,但亦可基本确立。因为在那个时代,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,只有通过权力机构,才能完成大面积的销售工作,然后加以筛选、加工、润色,并推广出去。以往,人们对搜集诗十分重视,认为这是满足统治者燕飨、充当教育贵族子弟教材以及了解民情的需要,事实上,搜集、整理诗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广诗,推广诗的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王室与地方的紧密联系,强化王族的统治。众所周知,周王室为了有效地统治各地,曾大封诸侯,让那些与王室有密切血缘关系的贵族们、那些立有军功的臣子们代表王室去管理地方。为了保证这些被分封到各地的贵族不为各地的方言、不同的习俗所“异化”,周王室通过诗歌,用统一的语言、文字、音韵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,用代表王室思想的作品去统一各诸侯国贵族们的政治观点、审美意识、道德情操及宗教信仰等,也就是说,诗被用来作周王室加强内部联系的黏合剂,成为周王室维系中央与地方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。《礼记·乐记》有:“乐者为同,礼者为异;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。”可见,礼是用来区分君臣上下、亲疏贵贱的;乐是用来团结内部、使之相亲相爱的。自然,乐并不等于诗,但乐与诗有着密切联系,尤其是在歌、乐、舞三位一体的时代,关系尤为密切。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,《诗经》大约是首开其例了。

五、孔子与《诗经》

孔子是第一个将《诗经》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,又是第一位研究《诗经》

的大师。他精辟地提出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“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……一部《论语》，竟有14处言及《诗》，孔子真正领会了《诗》的精髓。他从《诗》中领会到周人端庄方正的理性精神，从《诗》中悟出了中和之美的本质特征，更从《诗》中提炼出美刺的讽喻意识，他对《诗》的研究已完全突破了文学的藩篱，而是立体地、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地俯视与研究。多年来，人们习惯于围绕着孔子“删诗说”成立与否争论不休，其实大可不必。因为《诗经》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便有引诗，而此时《诗经》中许多诗篇尚未问世；《论语·八佾》有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，今本《诗经》便无最后一句；《荀子·天论》引《诗经》“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兮”，今本《诗经》无此言。可见从鲁隐公元年到战国末年，《诗经》作为一部典籍，始终处于流动状态，处于不断更新、补充、删节、完善的过程。孔子作为参与这一活动的重要学者，理应受到重视。从最新考古发现看，孔子删诗说很可能成立。研究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认识与评价，尤其是研究孔子从《诗经》中汲取精华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——儒学的过程，对于研究古代哲学、宗教、文化、思想的发展与流变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六、《诗经》的大序与小序

毛诗学派能取代三家诗，《诗序》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读《诗经》必须研究《诗序》，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。两宋之前，《诗序》的确是金科玉律，无人敢质疑。宋人以大胆的、创新的目光审视以往的一切，诞生了以欧阳修为首的疑序派，朱熹成为集大成者。两宋之后，存序派、废序派唇枪舌战千余年，可谓难解难分。对此热门话题，我们认为，首先，《诗序》的作者问题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宏从曼卿受学，因作‘毛诗序’，善得风、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”此说历来有疑问。近年，安徽阜阳出土了西汉汝阳侯夏侯灶的墓葬，其中有《诗》之简片170余条，其中三条与《诗序》有关，可见《诗序》至少产生于西汉前期，很可能是东汉卫宏在各家基础之上汇总而

成,故《后汉书》有此言。其次,《大序》《小序》的划分本是极简单的问题,结果让经学家们搞得神乎其神。我们认为,《关雎》篇前面的一大段文字应为《大序》,每篇前面类似解题的文字为《小序》。但《大序》又与《关雎》篇的《小序》夹杂在一起。即从“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”开始至“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”,为《关雎》《小序》的前一部分,再从“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”至结束,为《关雎》《小序》的后一部分,两部分合在一起,即《关雎》篇的《小序》。中间的一大段,即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……正始之道,王化之基”,为《诗大序》。至于《大序》为何套在《小序》之中,便不得而知。再次,《诗序》存废之争的本质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来解释《诗经》,以获得学术上的领导权。但这一斗争在客观上打破了毛诗学派独步天下的事实,促进了《诗经》研究,这倒是争论者所始料不及的。最后,我们认为,《诗大序》以总结《诗经》创作经验为中心,概括并发展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歌的认识,就诗歌的基本特征、社会作用、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,尤其是其美学思想,对后世影响极大。李泽厚先生称之为“东汉儒家美学的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”(《中国美学史》),所言不虚。

七、《诗经》的思想与内容

《诗经》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,全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及社会生活。为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,我们从《诗经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周代社会的思想意识两方面论述,以证实《诗经》内容之博大精深、包罗万象。

第一,《诗经》全面反映了周人的劳动生活,农耕、蚕桑、采摘、纺织、染色、建筑、狩猎、捕鱼、缝纫、搓绳、修缮、畜牧等,不一而足。这些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,不仅反映了劳动是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,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第一创造者,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劳动的热爱及贵族统治者对劳动的偏见(如“二雅”中仅有反映狩猎和畜牧的诗篇)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通过对反映劳动生活诗篇的研究,可以全面认识周代生产状况、产品的分配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,可以了解周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。

第二,《诗经》反映了周人的爱情、婚姻及家庭生活,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价值观念、审美观念,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、婚礼仪式等,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如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,或描写了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坦率表白,或描写了青年男女在一起游戏时的快乐和幽期密约时的兴奋,或描写真挚的相爱和刻骨的相思,或描写失恋时的痛苦和爱情受阻时的反抗情绪。可以说,这些作品记录了青年男女相亲相爱的全过程,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反映了周代劳动人民的爱情观,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。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,婚姻是延续人类社会的纽带,先民们十分重视婚姻问题,《诗经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反映婚姻问题的诗作,这些作品记述了媒人的活动,突出了媒人在婚姻问题上的重要地位,记述了隆重的迎亲仪式和繁杂的新婚典礼,甚至记录了一曲曲动听的赞美新郎、新娘的颂歌,再现了那热烈、喜悦、欢乐的场面,为我们研究上古时的民俗风情及婚姻制度,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作为农业部族的周人,十分重视家庭的稳定,把能否治理好家庭视为是否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标志之一,《大雅·思齐》有“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”,即为例证。《诗经》中许多诗篇,或描写夫妻间融洽和睦的家庭生活,或描写夫妻分别时难舍难分的情感,或抒发久别重逢的喜悦,或抒发深切的悼亡之痛,或记录信誓旦旦的诺言,或记录弃妇们发自心底悲怆的呼声,生动地再现了三千年前家庭生活的全貌。这些作品,感情缠绵细腻,风格婉约多姿,成为《诗经》中思想性、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之一。

第三,《诗经》反映了周人的兵役、徭役及战争生活。兵役、徭役是统治者强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,尤其是西周后期“王道衰,礼义废,政教失,国异政,家殊俗”(《诗大序》),再加上“四夷交侵,中国皆叛,用兵不息”(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序),使得兵役、徭役格外沉重。大量诗篇通过服役者的悲鸣及他们对亲人的思念,反映出服役者为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反抗,从而揭示了兵役、徭役制度的不合理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类作品有许多是下层官吏所作,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劳逸不均、分配不公的矛盾,从而再现了那个危机四伏、矛盾重重、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时代特征。《诗经》中的思妇之作,无论是含情脉脉的期待还是以酒消愁的苦闷,无论是怒气冲冲的埋怨

还是激烈铿锵的誓言,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合理的兵役、徭役制度给服役者的亲人家属带来的巨大精神痛苦,有力地鞭挞了周代的兵役、徭役制度。这类作品感情丰富,描写细腻,语言诚挚,生动感人,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悲剧气氛,吸引了千万读者。战争伴随着人类的诞生来到人间后,就没有停止过一天。这些血与火的战争,客观上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催化剂,加快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与融合,但在当时,却给人民带来无数灾难。《诗经》非常重视战争的记叙,这些诗作中没有短兵相接的搏斗,没有血肉横飞的厮杀,有的只是对天子功德的歌颂,对将帅英武的赞美,对王师军容的强大及部队武器装备之精良的褒誉。自然,这与周人以修明德、崇尚礼义为上征战杀伐为下的思维模式有关,同时,这也是周人推崇谦恭和顺、温柔敦厚的理性精神的反映,是周人追求中和之美的潜意识的流露。毫无疑问,这些诗作奠定了我国二千年来战争诗的基本模式与格调,影响可谓大矣。

第四,《诗经》反映了周人的政治生活。所谓政治,是指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及本阶级内部不同利益、集团之间的斗争。《诗经》所反映的政治生活,首先就是奴隶们对奴隶主贵族的揭露与批判,这些诗作将统治者的凶狠残暴、贪得无厌、荒淫奢靡、道德沦丧等种种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,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这些作品记录了周代人民反抗斗争的轨迹,反映了人民参与意识的提高与成熟,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,堪称现实主义文学佳作。“二雅”之中有一批贵族知识分子们在厉、幽时期,出于对国家前途、社会安宁及人生价值能否实现等问题的冷静思考,创作出一篇篇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作。这些作品描写了国势衰微、夷族入侵、危机四伏、怨声载道的形势,抒发了身受排斥、不为重用、报国无门、前途渺茫的苦闷,宣泄了被诬罹祸、处境困顿、忧谗畏讥、举步艰难的怨愤,批判了昏君党人专擅权力、倒行逆施、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,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,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生动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。这些诗作,以其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浓郁的抒情风味,成为《诗经》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诗篇。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计民生,拯世济民的性格特征的形成,他们